

蒋英豪选注 中华书局

近代诗人咏香港



21.7

YONG XIANG GANG

近代诗人咏香港

蒋英豪选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诗人咏香港/蒋英豪选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6
ISBN 7-101-01642-1

I. 近… II. 蒋…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近代
IV. I222. 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679 号

责任编辑:陈 铮

责任校对:王凯生

版面设计:张晋波

封面设计:杨华如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6 印张·111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12.60 元

导 言

一、香港与近代诗

在现存的近代诗歌中，“香港”是一个常见而惹人注目的主题。在“近代”以前，也就是在鸦片战争(1840)以前，咏及香港的诗歌难得见到。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也把近代知识分子和近代诗人的目光带到香港。英国发动战争，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求割让香港，而事实上，战争还未结束，《南京条约》还未签订，英国已迫不及待威逼琦善(1790—1854)签订“穿鼻草约”，并派兵在1841年1月26日占领了香港岛。因此，在鸦片战争期间，香港已成了当时诗人关注的重点。当时在诗中咏及香港的诗人，如左宗棠(1812—1885)、张鸿基、姚莹(1785—1853)等，都不曾到过香港，在战争前也根本不曾听过“香港”这地方，但他们直觉上都意识到“英夷”占据了“天朝”这个孤悬海外的蕞尔小岛，是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因为在清朝统治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中，还不曾出现过这样震撼人心的国耻。

本书所谓“近代”是指从鸦片战争(1840)到五四运动(1919)这段历史时期。就中国诗歌发展而言，这个时期自具特色，有异于前此的传统诗歌，也与后此的新诗截然不同，带有

浓厚的过渡时期色彩。所谓“近代诗人”，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有诗歌创作活动的诗人。这些诗人以香港为题材的诗作，不论是写于香港还是写于香港以外地方，也不论他们有没有到过香港，都在本书介绍、探索范围以内。当然，绝大部分以香港为主题的诗歌，都是出于诗人的香港之行。为了讨论上的方便，我们不妨把这个范围简称为“近代诗人的香港诗”。

“近代诗人的香港诗”数目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很不容易作出准确的回答，起码我们目前还没有具备回答这个问题的条件。这些“香港诗”，大部分散见于曾经到过香港的近代人物的诗集中，其数量极为可观。近代诗人到过香港的为数不少，这主要是由于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香港渐成南中国的航运的中心，出入广州或者从华北、华东到南洋、欧洲去，香港都是必经之地，而香港也因为“天朝弃地”的历史烙印和国际都会的崭新形象，吸引了这些过客的目光，在诗中留下了他们的香港印象和香港游踪。举几个较著名的近代诗人为例，黄遵宪（1848—1905）的《人境庐诗草》有香港诗十二首，丘逢甲（1864—1912）的《岭云海日楼诗钞》有近二十首，康有为（1858—1927）的《康南海诗集》有逾三十首，王韬（1828—1897）的《蘅华馆诗录》有逾四十首。其余集中有一首到十多首香港诗的近代诗人，数量更是不少。保守估计，近代诗人诗集中与香港有关的诗歌，为数应在千首以上。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资料群，其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二、香港诗的作者

这个庞大的资料群，其作者的身份也极为纷杂。这里面有政治上尚未露头角的未来大官宦，如左宗棠；有启蒙思想家，如魏源（1794—1857）；有以诗话形式宣扬抗英斗争的诗评家，如林昌彝（1803—1876）；有维新派的领袖，如康有为；有外交官，如黄遵宪；有军幕的幕僚，如黄焕中（1832—？）；有朝廷通缉的钦犯，如王韬；有太平天国的领袖，如洪仁玕（1822—1864）；有租借新界时中方负责勘界的官员，如熊世池；有与光绪帝（载湉，1871—1908）关系密切的“帝党”核心成员，如文廷式（1856—1904）；有当时的重要诗人，如何绍基（1799—1873）、易顺鼎（1858—1920）；有香港土生土长的政论家，如胡礼垣（1855—1916）；有长期居港的报人，如潘飞声（1858—1934）；有海外华侨，如丘炜菱（1874—1941）；有辛亥革命后避地香港、以遗民自居的官员，如陈伯陶（1855—1930）；有旅港授徒的教书先生，如罗濂；有革命派阵营的南社诗人，如黄节（1873—1935）。从这些诗人的身份背景看来，香港的确吸引了来自不同圈子的近代诗人的关注。

这些诗人来港以及他们的“香港诗”的写作时间，也遍及近代的各年代。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写诗论及香港的，有左宗棠、张鸿基、姚莹等诗人；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就到香港游览考察并留下诗篇的有魏源、何绍基等人；19世纪50年代来港的有洪仁玕，60年代有林昌彝、王韬，70年代有黄遵宪，80年代有康有为，90年代有黄焕中；踏进20世纪后来港的有丘逢

甲、黄节等人，辛亥革命后来港的有陈伯陶、赖际熙（1865—1937）等人。近代诗人既见证了香港各个不同时期的变化与发展，他们也因香港与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关系而有不同的感受。举例而言，19世纪康有为“伤心信美非吾土，锦帕蛮靴满目非”（《初游香港睹欧亚各洲俗》）的激昂感叹，到了辛亥革命（1911）以后已转变为陈伯陶的“欲学忘机狎鸥鸟，野童溪叟莫相猜”（《九龙山居作》）的隐逸宣言了。

近代诗人来港、经港的原因，也各有不同。他们有些是不远千里，专程来看这块“天朝弃地”的，如魏源、何绍基；有受朝廷追缉而以香港为“遁逃藪”的，如王韬；有在香港长居和发展事业的，如潘飞声；有来香港处理公务的，如郑观应（1842—1922）；有为勘界而来的，如熊世池；有为探亲而来的，如康有为；有自命“义不食周粟”的“隐逸”、“遗民”，如陈伯陶；有为避内地战事而来的，如左秉隆（1850—1924）；其余占大多数的是因种种原因而路经香港的过客，像应乡试而路过香港的黄遵宪，往返广州而路过香港的文廷式，因公务到南洋而路过香港的丘逢甲，为求军援而途经香港的黄焕中，回侨居地新加坡而在香港短暂停留的丘炜萋。香港吸引许多人物路过，除了说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是中外南北交通的枢纽，也足以显示其国际都会的魅力。

这批诗人居港的时间也长短不一。有仅作短短一日之游的，如魏源、何绍基；有盘桓数日的，如黄遵宪；有停留三数月的，如康有为；有长居达二十年的，如王韬。他们之中，有些是欲留而不能留的，如郑观应；有些是不欲留而不得不留的，如王韬；也有立定主意在此终老，视此地为第二故乡的，如陈伯

陶。他们对香港的认识虽有深浅之别,但他们诗中呈现的感性印象却是明晰而各具特色的。

近代作家对香港的印象并不停留在感性印象的阶段。近代诗人中有维新改革倾向者为数不少,他们当中很多是由于香港之行的刺激,比较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不同,而醒悟到中国必须变从西法。黄遵宪 1870 年的香港之行,全面而深入地观察了这块新兴殖民地的设施与故国大地的不同,初步孕育了维新的蓝图;康有为 1879 年的香港之行,“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从观念上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而感受到维新的迫切需要。也有些早具改革思想,因在香港所见而巩固了他们改革的信念,益信中国之不得不“师夷长技”的,如魏源、王韬、郑观应等。至于胡礼垣等人,植基香港,以香港经验反馈国内,也形成了近代改革思潮的一个重镇。香港刺激了近代诗人的改革维新思想,他们的香港诗中也明确展示了改革维新的思想。

三、香港诗的作品

魏源在 1847 年的香港之行,虽然只写一首《香港岛观海市》,而且是夹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手法记下他的香港印象,这首诗却为以后几十年不断涌现的“香港诗”定下了基调。他在诗中特别强调的三样东西:建筑、商业与军事,在以后的香港诗中衍生了很多变奏与回应。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其宏伟巍峨的建筑,是最先吸引近代诗人视线的东西。不

少近代香港诗都写到这些内地罕见的建筑,如何绍基《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层楼叠阁金碧丽”,王韬《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四重金碧专喜居层楼”,丘逢甲《海中观日出歌由汕头抵香港作》:“金碧楼台老蛟守”等都是。在山腰和山上盖起来的房子,也是诗人常会捕捉的景观,如康有为《初游香港睹欧亚各洲俗》:“半空楼阁凌云起”。由山岛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晚上特殊的灯火景观,更是诗人所津津乐道的,如黄遵宪《香港感怀》:“火树银花耀”,康有为《重九夜登高上太平山》:“处处银灯明重楼”,文廷式《夜泊香港》:“鬼灯明灭非人境,山市虚无似化城”,左秉隆《徙居九龙》:“灯明隔岸峰”。易顺鼎的《香港看灯兼看月歌》,更以五六百字的长篇,用赋的笔法,全面刻画摹写香港岛晚上璀璨的灯火。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其因频繁的商业活动而带来的繁荣富庶景象,也是近代诗人乐于采以入诗的。王韬写于1863年的九言诗《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中就说“贾胡居奇光怪炫列货”,而黄遵宪写于1870年的五律组诗《香港感怀》,更以此作为诗歌中的一个主题,第二首说“帆樯通万国”,第三首说“毡衣绣缕铺……欲界亦仙都”,第五首说“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连环屯万室,尺土过千金。……黄标千万积,翻讶屋沈沈。”他们都为商业社会物质的富庶繁华所震撼。

香港由外国人占领、统治的事实,更是近代诗人耿耿于怀,无时或忘的。康有为《初游香港睹欧亚各洲俗》说:“锦帕蛮靴满目非”,写外国统治与国土沦丧的感慨;黄遵宪《香港感怀之二》说:“虎穴人雄据”,毫不含糊的写出侵略占据的事实;熊

世池《奉台檄诣九龙勘界》说：“海山非净土”，则委婉表达大好江山已非王土。由于外国统治而引致的服饰风俗种种转变，更是近代诗人香港诗中常见的素材，如丘逢甲看到“异服鱼龙杂”（《香港书感》），何绍基看到“服饰全非中土制”（《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黄遵宪观察到“蛮腰跨革靴”与“夷言学鸟音”（《香港感怀之四、之五》）。

近代诗人香港诗中对香港的叫法，往往透露了他们对香港的观感与态度。王韬居港初期，称香港为“番州”（《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今乃放眼万里来番州”），表露他对这个被英国人割占不久、传统中国文化相对低落的殖民地的鄙夷和对流落这个海岛的无奈。林昌彝在鸦片战争后二十年经过香港，称香港为“鬼岛”（《渡海》：“楼槛排山鬼岛开”），他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与他毫不妥协的抗敌斗争精神，跃然纸上。康有为初次在香港接触到西方文化，看到了中国的前景与希望，他称香港为“灵岛”（《初游香港睹欧亚各洲俗》：“灵岛神皋聚百旗”），我们从中可以感到这位改革家希冀向西方学习的情怀。文廷式在未达时途出香港，称香港为“化城”，以“鬼灯明灭非人境，山市虚无似化城”（《夜泊香港》）描写香港的夜景，表达了对这美丽但已为人所占的都会的矛盾复杂心情。

近代诗人对香港的认识，并不停留在游客过客的肤浅层面。有些诗人逗留时间虽然很短暂，只有一天半天，但他们已看得很深刻，很长远。魏源在刚起步建设的香港只留了一天，但他凭在编撰《海国图志》时学得的世界知识，在1847年写的《香港岛观海市歌》已预告了香港将成为一个雄伟的大都会。何绍基也是在香港匆匆经过，歇宿一宵，他却能在1849年写

的《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中指出“止为人人习重学，室宇车船等仪器”，揭示香港进步的科学基础。王韬长期在香港生活，他对香港的认识在当时国内也许无人能及。他全面介绍香港的文章《香港略论》，是19世纪国人认识香港的指南，也对黄遵宪写《香港感怀》十首有明显影响。他的《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对香港平民日常生活及滞居香港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有细致的描写。黄遵宪虽非长期居港，但他“史家”的特长，在他早年写的《香港感怀》十首表露无遗。这组诗是近代诗人咏香港诗中涵盖面较广的，不单写及社会的各方面，也对中国内地与香港关系、中国与英国关系有透彻的分析，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港英以香港为基地对中国进一步侵略的忧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国应如何从香港学习自强维新。这是一组义蕴很丰富的香港诗，难怪历来备受选家的青眼。像他这样从香港看到中国前途所系的近代诗人为数不少，丘逢甲、文廷式、康有为等人都以改良家的精锐目光从香港看到中国应走的路以至大同世界的远景，他们对香港的认识无疑是很深刻的。

近代诗人的香港诗中也展示了几十年中香港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剪影。王韬的《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刻画了在繁华的背后一般市民生活的寒伦：“瘦妻娇女啼哭思故土，一家四人卧床无一瘳。半椽矮屋月费半万钱，风逼爨烟入户难开眸。木中虬虱啗人若利锥，爬搔肌肤往往至血流。”丘逢甲的《饮香江酒楼即席作四首》写到世纪之交香港文人酒之会征歌逐色的生活；潘飞声的《香海集》中也有大量这类诗歌。康有为的《居香港英辅政司骆乞通华文能论中国事频来慰问请茶

会索诗港督卜君存问殷殷派警士廿人保卫夫人赠画感谢并呈》记录了晚清维新派政治人物与香港政府高层的交往。陈伯陶的《九龙山居作》写到了“遗民”们避居香港的“隐逸”生活；这类诗在辛亥革命后大量出现。罗濂的《坐汽车匝游港山》记录了20世纪初有闲阶级“绝壁飞车”的优闲生活。胡礼垣的《戊申年水灾香港女界售物赈灾诗》记录了20世纪初年香港妇女参与社会的活动，他也颂扬了当时兴起的女子教育在提倡女权和解放妇女等方面的成效。叶应铨的《游香港杂诗》三十余首更是当年香港社会的风情画，详细记录了诸如宵禁等日常生活细节，并附有诗人的“自注”，很像晚清流行的记海外风情的竹枝词，只是叶氏是用五言形式写的，而竹枝词则惯用七言。由此可见，近代香港诗中所展现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而生动的。

近代诗歌中的海外记游诗，许多是用竹枝词的形式写的，但近代香港诗中相对而言少有竹枝词。王韬诗中有一首题为《吴香圃以香港竹枝词囑诗口占答之》，可知当时人也很希望读到写香港的竹枝词，不过王韬所写的香港竹枝词只有这一首，他并不像其他晚清诗人写海外竹枝词那样长篇累牍的一百几十首的写下去。他另一首题为《粤中市俗书字多不可识绝无意义》的诗，嘲笑当时香港社会的错别字现象，勉强也可算是竹枝词。近代诗人香港诗中少竹枝词，主要是诗人接触到香港的题材时，由于香港的历史烙印，都倾向于写较严肃的主题，因此也就较少用竹枝词这种较轻松活泼俏皮的诗体了。

近代香港诗的体裁，也包容传统诗歌的各种形式。举例而言，五古有康有为的《居香港英辅政司骆乞通华文能论中国事

频来慰问请茶会索诗港督卜君存问殷殷派警士廿人保卫夫人赠画感谢并呈》，七古有魏源的《香港岛观海市歌》，五律有黄遵宪的《香港感怀》，七律有文廷式的《夜泊香港》，五绝有叶应铨的《游香港杂诗》，七绝有郑观应的《香港晚眺》等。其中五律与七律是最常见的形式，五绝则所见不多。最特别的还是王韬《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所用的九言古体，这种体裁在传统诗歌中并不多见。

这批香港诗的文学成就也不容小觑，其中许多作品都闪发出艺术的光芒，是近代诗歌中的优秀作品。举例而言，黄遵宪的《香港感怀》，是《人境庐诗草》中的代表作之一，充分展示诗人运用古典语言与典故的功力，也是近代诗选家常常选中的作品。张鸿基的《读史有感》，是近代讽刺诗的上乘之作，开晚清以诗歌谴责败政的先河。魏源的《香港岛观海市歌》，体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最佳结合。康有为的《重九夜登高上太平山》，表现了无穷魄力，是《康南海诗集》中的杰作。易顺鼎的《香港看灯兼看月歌》，是咏香港夜景诗的力作，在易氏的山水诗中也别树一帜。丘逢甲的《饮香江酒楼即席作》，虽是征歌逐色、歌筵饭席之作，但绮丽中见凄婉，与辛弃疾（1140—1207）的“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和龚自珍（1792—1841）的“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己亥杂诗》）相比，毫不逊色。

由于香港政治环境特殊，近代诗人多对香港带有一种异常的感情。香港的割让，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是鲜有先例的事；香港在外国统治下的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近代诗人在香港深刻感受到国耻，他们也在

香港得到不少启发。他们所写的香港诗,在题材、内容与感情的表达方面也就与传统诗歌有显著的不同,形成一个特别的类别。可惜数十年来留意到这类“香港诗”的学者并不多。香港正踏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候重温、了解这些丰富多采、饶有特色的诗歌,应是特别有意义的。

四、香港诗的注释

过去几十年出版的近代诗选注本,都选了一些香港诗。其中最受选注家注意的是黄遵宪的《香港感怀》,在不少选注本中都入选,虽然许多只是选注其中一两首,但也有十首全选注的,如钟贤培等选注的《黄遵宪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当然也是十首全注。其他近代诗人的香港诗被选注的有何绍基、洪仁玕、康有为、丘逢甲等,但为数并不多。此外,伯子在1984年发表《晚清两诗人笔下的香港社会》(《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讨论了黄遵宪的《香港感怀》、《到香港》、《自香港登舟感怀》,丘逢甲的《香港书感》、《九龙有感》、《题兰史香海填词图》、《饮香江酒楼即席作》等诗作,也带有注释的性质。与此同类的还有高拜石的《黄公度香港感怀诗》(载《古春风楼琐记》,台北:《新生报》,1978)。

一般近代香港诗注释尚未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选注者对香港历史认识不足。香港诗与香港历史的关系密不可分,选注者由于资料不足,对香港历史所知有限,所依据的往往只有王韬的《香港略论》、陈饒勋的

《香港杂记》等材料，未能清楚交待诗歌的历史背景和诗中涉及的当时社会状况。例如黄遵宪《香港感怀》十首之八的末句“独少市声嚣”，注释者都没有留意到香港从1842年到1897年针对华人实施宵禁，入夜市声不嚣，原因在此。二是对诗人与香港关系认识不足。选注者往往把一首香港诗独立来看，不注意诗人与香港的密切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因此在关键之处不能把握发挥，使原诗许多义蕴都不能得到充分展露。例如魏源在《香港岛观海市歌》借海市蜃楼写香港，故意混合了浪漫与现实，便与他跟鸦片战争的关系与经历很有关。不明白这点，诗便不好了解，这也许是选注家多不选这首诗的主要原因。

本书详细分析讨论的五十五首诗，是从数百首近代诗人的香港诗中选出来的，分属二十六位诗人。这些诗人，其诗歌成就大多已获肯定。选取时特别留意诗中是否展示丰富的有关香港的素材，足以使读者对近代香港有进一步的认识；其艺术成分是否可观，即使不考虑其香港因素，是否也可以作为一首优秀的诗歌来欣赏。其中如洪仁玕、黄焕中、郑观应等几位作家，虽然诗歌的名气不大，但由于他们身份特殊，他们的香港诗为我们了解近代香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近代诗人与香港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本书也酌量选注其诗作。

题材相同的诗，本书只选一两首作为代表，避免内容重复。例如近代诗人咏宋皇台的诗为数不少，苏泽东且有《宋台秋唱》的结集，本书只选了赖际熙的《登宋王台作》二首以概其余。选取的诗人，录诗一首至十余首不等，视具体可选诗作而定。选得最多的是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十二首有关香港的

诗歌全部入选,这固然是由于他的诗歌艺术成就较高,也因为这些诗内容丰富,可以增加我们对近代香港的认识。诗歌的编排,大致以诗人初到香港所作诗的年份为序列,读者可从这样的编排粗略看到几十年间近代诗人香港诗题材内容的演变。

我在注释这些诗的时候,参考了不少关于香港的专著与史料,希望把香港诗中的历史还原出来,以助读者了解和欣赏。我也尝试追查诗人与香港的渊源与关系,使读者对诗人创作的动机与用意有更清楚的了解。诗中所用的典故与语词,我也不厌其烦,寻根究柢,并以之与诗人的背景和诗中的香港背景相配合,希望能揭示出诗人的本意。这几方面的尝试,目的在打通隔开诗与历史的墙,使读者在读诗的时候,能回到一百年前诗人所面对的现实里去,与诗人同忧共乐。读者若因本书而对近代时期的香港社会与历史增加认识,作者更深表欣悦。

目 录

导 言		(1)
左宗棠	感 事	(1)
张鸿基	读史有感	(4)
魏 源	香港岛观海市	(8)
何绍基	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 约水程二千里	(16)
洪仁玕	香港饯别	(22)
林昌彝	渡 海	(24)
王 韬	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	(28)
黄遵宪	香港感怀十首	(42)
	到香港	(67)
	自香港登舟感怀	(69)
康有为	初游香港睹欧亚各洲俗	(73)
	裙带路	(76)
	重九夜登高上太平山	(78)